

中东欧国家周报

【斯洛文尼亚社会周报】

过去 30 年斯洛文尼亚社会阶层的变化

Helena Motoh

(2021 年 2 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Feng Zhongping



【斯洛文尼亚】过去 30 年斯洛文尼亚社会阶层的变化

概要

在过去 30 年发展进程中，一些关键因素对斯洛文尼亚社会和经济变革产生了影响，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斯洛文尼亚从社会主义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以及 2008 和 2009 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及其后的复苏。斯洛文尼亚社会中不平等问题的起落反映了这些因素的存在以及社会阶层的变化，特别是过去十年间斯洛文尼亚中产阶级中发生的变化。

过去 30 年中的（不）平等问题

相对而言，斯洛文尼亚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其在过去 30 年的基尼系数稳定在 23 至 27 之间。斯洛文尼亚社会的相对平等主要体现在社会转移支付（social transfers）和退休金制度上，这是斯洛文尼亚保持不平等程度低位的关键。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平等水平很低，1987 年斯洛文尼亚的基尼系数仅为 21.5。虽然经济转型与 1991 年 6 月实现的政治独立进程同时开始，斯洛文尼亚用了十年时间才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转型。作为第一步

措施，早在斯洛文尼亚独立前的 1990 年夏，前南联盟就在联盟层面上对公司法进行了修改，废除了工人委员会，并采用了由董事会、经理和大会（assembly）组成的新领导模式。新公司法促成了私有化进程以及私营企业的建立，促成了大型国有企业在私有化进程中分解为小公司的趋势，同时也推动了小型私营企业的建立。国有公司私有化模式的建立需要较长的时间。在两种主流模式及其重要推动者——斯洛文尼亚经济学家尤热·孟琴格（Jože Mencinger）和美国顾问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两年之久的辩论后，斯洛文尼亚最终在 1992 年底通过了立法。大部分的私有化都是通过内部收购（25%）、转让给投资基金（19%）、内部分割（18%）和股票出售（13%）来完成的，重要的是通过国家执照制度，让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将自己的股份投资到公司或投资基金中。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转型期的头几年里，斯洛文尼亚不平等现象呈显著增加的趋势。1987 年斯洛文尼亚的基尼系数为 21.5，1993 年升至 27.2，1998 年又回落至 24.2。

即使在转型之后，斯洛文尼亚相对较低的不平等水平也存在部分误导作用，因为其并未反映收入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市场收入的实际不平等情况（税前和转移支付前（before taxes and transfers）），而只是反映了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情况（税后和转移支付后）。20 世纪 90 年

代，社会转移支付对缓解斯洛文尼亚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状况起到了关键作用。与 1983 的 21.9%相比，1993 年有 25.1%的斯洛文尼亚家庭接受了社会转移支付。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失业补助：与 1983 年的 0.1%的家庭相比，1993 年有 8.1%的家庭领取了失业补助。如果没有社会转移支付，1993 年的基尼系数将上升至 30.5。在后来的十年里，斯洛文尼亚不平等情况逐渐稳定下来。2000 年，基尼系数首先升至 24.7，然后缓慢下降，到 2007 年系数回落到 23.3。

2008 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后的动荡也对斯洛文尼亚不平等等问题产生了一定影响。斯洛文尼亚的经济危机对国内大型企业造成了严重影响，尤其是几乎崩溃的建筑业企业。在接下来的五年内，斯洛文尼亚失业率迅速上升，从 2008 年的 8.2%上升到 2014 年的 17.7%；经合组织国家中斯洛文尼亚的相对地位排名也从原先的第一降至 2013 年的第四位。虽然与欧盟平均水平或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相比，这一不平等水平仍然极低，但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达米扬，详见文末）警告称，后危机时期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在这一统计数据评估中。在危机期间，由于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比高收入人群受到的影响更大，斯洛文尼亚不平等水平实际上上升了十分之一。最低收入人群的情况最为严重：在 2007 年至 2013 年期间，10%的最低收入人群收入

下降了三分之一。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后危机时期，市场收入不平等实际上比可支配收入不平等增长得更快。前者的变化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而后者由于税收及社会转移支付的影响保持了相对稳定，否则按基尼系数计算，基尼系数将上升至 40 以上。这也使得斯洛文尼亚原先极低的不平等水平变得不那么稳定，如果斯洛文尼亚的政治改革对社会转移支付或养老金制度产生可能负面影响的话，那么不平等情况将迅速恶化。这也意味着，在目前斯洛文尼亚卫生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中的任何私有化干预措施，都可能使实际收入不平等状况更加显著。

社会阶层的变化

后工业化时期，社会阶层化（social stratification）发生了全球性的变化。作为后社会主义国家，斯洛文尼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历了国家制度转型下的一系列社会与经济变化。斯洛文尼亚最为彻底的经济转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经济转型在社会阶层化上得到反映，包括新型精英阶层的出现以及社会整体上的重组。新型社会精英诞生于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合点，特别是由社会主义后期公司经理在私有化过程中转变成的大股东。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并合，主要是以高层政治人物通过成为大型企业高层管理者而进入商界的形式实

现。这一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流”是后社会主义社会的典型现象。斯洛文尼亚过渡时期社会分层变化的特点是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并合，而这也是基于国有财产私有化的战略。

因受转型、工业生产的全球性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尤其对特定行业的影响，如斯洛文尼亚的纺织业），社会底层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失业率的增加，低素质工人、退休者、父母失业的大家庭等成为了社会底层中最脆弱的群体。中产阶级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下层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他们的收入以商品生产和服务为基础，而上层中产阶级的收入则来自私营部门和管理层。最低收入阶层人数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只能获得勉强维持生存的收入，例如领取最低养老金的退休者、失业者、社会保险领取者、穷忙族、少数民族等。危机后十年的经济动态也带来了一个新的不利趋势，即劳动力不稳定状况，尤其是迫使年轻雇员成为分包商的行为，使其失去了就业保障的一切有利因素。

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也十分重要。在对斯洛文尼亚与德国中产阶级情况进行对比后，结果具有显著差异。狭义的中产阶级是指收入位于全国收入中位数 80%至 150%范围内的人口。在斯洛文尼亚，这一中产阶级群体占全国 45%的劳动力人口，与德国相当。但是，斯这一阶层的

购买力与德国相比明显较弱：在斯洛文尼亚，一位中产阶级要为一辆中档汽车省下 22 个月的收入，而德国的中产阶级只需要省下一年收入。在生活费用和租金方面，两国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斯洛文尼亚人的储蓄潜力相对于德国而言低得多。

结语

在过去三十年斯洛文尼亚的社会阶层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90 年代的经济转型和国有公司私有化，以及 2008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一段时期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斯洛文尼亚社会分层情况也发生了明显转变。斯洛文尼亚社会上层在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的交汇处发生了转变，出现了新型的政治经济精英。斯洛文尼亚中产阶级正朝低收入方向发展，其与经济实力较强的欧洲国家中产阶级相比处于明显弱势地位。斯洛文尼亚社会底层则遭受了主要来自经济转型和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

（作者：Helena Motoh；翻译：何岷松；校对：郎加泽仁；签发：陈新）